

战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进程

林 玉 国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是战后世界最突出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迄今,在第三世界各地区中,尤以拉丁美洲的城市化水平为最高,城市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最突出。七十年代,拉美五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只有四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墨西哥城和里约热内卢),五年之后,波哥大和加拉加斯也跃入这一行列。拉美这类城市的人口每十年就增加一倍。截至1984年年中,拉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8%,接近发达地区(72%)。城市化问题已成为拉美国家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因此,研究战后拉美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都具有现实参考和借鉴意义。

战后拉美城市化的特点

城市化有两大标志:由资本流动引起的生产的积聚和集中;与此相适应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世界城市化进程表明,城市化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和文化等愈来愈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共同现象,拉美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拉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的特殊性,决定了战后拉美城市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城市化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密切相关。战后拉美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1950-1980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5%,高于除日本和西德之外的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

发展中国家前列(不包括石油输出国)。拉美制造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在1950-1975年期间高达6.9%,产量增长五倍^①。飞速的现代化带来了城市的高速发展。战后拉美城市人口年增长率高于战前各个时期。与战前城市发展最快的1920-1940年相比,前十年拉美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后十年仅为2.9%;而1940-1980年的四十年间,城市人口一直以年平均4.5%的高速增长着^②。拉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是以前各个时期所没有的。

二、各国间城市化发展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差异很大。由于拉美各国独立的时间和城市化的历史基础不同,造成了各国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异。加勒比地区城市化水平最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80年仅为52.15%;中美洲稍高,为60.75%。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82.18%,高于发达国家(72%),属高度城市化国家^③,其他拉美国家为64.85%。如以国家比较则差距更大:1980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1.47%,而乌拉圭却高达84%,相差十分悬殊。

三、在第三世界中拉美城市化水平最高。战后拉美城市化速度快于亚洲,略低于非洲。但由于拉美城市化起步早,基础高,所以城市化水平远较亚洲、非洲为高。以城市

① 《当前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问题》中国财经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页。

② 联合国:《世界人口趋势和政策》1979年。

③ 联合国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司《人口研究》第38号《城市人口增长类型》,1980年,表50。

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看,截至1984年年中,发展中地区的平均水平为31%,其中非洲为32%,亚洲为28%。拉美为68%,远高于亚非两洲^④。

四、大都市化十分突出。战后以来,世界人口急剧向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的扩展速度相对缓慢,拉美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墨西哥城1982年有人口一千四百万,居世界第三位。在1970-1982年十多年间,墨西哥城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1983年其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35%。阿根廷的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已达一千万,占全国人口的35%,占全国城市人口的42%。秘鲁首都利马的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50.9%。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1973年人口为一百四十五万,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80%。巴西的两个一流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在八十年代前者就已超过一千万,后者也达到近九百万。到1975年,除古巴的哈瓦那外,拉美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九个,它们是: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累西腓、贝洛奥里藏特、圣地亚哥、利马和加拉加斯。

拉美城市化成因的分析

战后拉美城市化同许多社会经济现象一样,不是一个孤立变化的进程,而是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拉美地区特定的生产分布规律作用的结果。尽管战后拉美各国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它们基本上属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分布规律对人口城市化起关键作用。

(一) 战后工业化与城市化

在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城市化无一不是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二次大战以后,拉美各国都制定并实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在1950-1980年间,工业生产增长五倍,

年均增长率达6.6%。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带来了城市人口的高速发展。1950年拉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1%,八十年代中期已接近70%。城市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吸收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在此期间,拉美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经济自立人口中的比重由12.5%增加到18.1%。

同时,现代工业的发展带动了一系列服务部门的产生和发展,间接促进了城市经济人口的需求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另外,“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含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⑤。一方面,工业中心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业,教育文化科学机构,法律机构,行政机关和警察机构,在天主教盛行的拉美,也离不开神职机构,这些机构能够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口;另一方面,大工业中心往往也是超级富豪的聚集地。据统计,载入《拉美人物》一书中的墨西哥名人中,83%在首都墨西哥城居住。其它各国也大致相同。资产阶级的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⑥这些也是增加城市人口的因素。

(二) 农业现代化和土地所有制与人口城市化

战后以来,拉美农业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土地进一步集中,大批小农贫困、破产,纷纷涌向城市。1950年拉美城市人口为六千七百五十一万一千人,1980年达到二亿四千零五十九万二千人。拉美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农村向城市移民造成的。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城

^④ 联合国:《1984年世界人口资料表》。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8页。

市化的一般情况。拉美国家由于农村中存在着二元结构,即现代农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以及外国资本的渗透,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和前资本主义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原因也可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1950年以来,在拉美农业中出现了两个新特点:一是耕地面积大幅度增长,从1950-1955年间的五千三百万公顷增至1975年的九千三百万公顷;二是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断提高。拉美农业大量采用新生产技术,包括广泛使用机器、电力、良种、肥料、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因而大大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六十年代初,拉美拖拉机拥有量为四十三万五千台,1977年增加到八十六万五千台,几乎增加了一倍,1978年拥有收割机和脱谷机约十一万六千台。据统计,六十年代末,在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和委内瑞拉,每一百到二百公顷耕地平均拥有一台拖拉机,这一比例与在农业上实行粗放经营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和苏联非常接近。资本主义农业机械化使“耕种一定面积的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一般地说是减少了”^①。1950-1980年间,在现代农业部门中就业的劳动力占经济自立人口的比重,在十四个拉美主要国家中,除墨西哥、危地马拉下降幅度较小和巴拿马略有上升外,其它国家都大幅度下降。十四国的平均比重也由22.2%下降到12.3%。农业机械化是使农村就业人口减少,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的主要因素。

第二、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

如果说,现代农业部门的机械化是造成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一种积极推动力,那么,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则是一种消极的推动力。这后一种推动力在战后拉美农村人口城市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当前,拉美国家的土地占有制度是在殖民地时期的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逐步发展

形成的。拉美土地关系的特点是,土地和农业高度集中在大庄园主、资本家和国内外大垄断组织手中,而占农户数很大比重的小农和半无产者只占有极少量土地。直到1965年,拉美全部可耕地的93%属于7%的大土地所有者。六十年代末,据国际劳工局统计,农村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约占农村自立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七十年代中期,拉美无地农民仍有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之多。这些人为了生存纷纷涌往城市。尽管从本世纪以来,尤其是从六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进行了土改,拉美土地结构的特点仍然是土地分配非常不均,这是拉美农村就业不足的主要原因^②。

(三) 国际和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分布规律,使拉美工农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造成超过工业化需求的人口城市化。

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不同于欧美各国。后者的城市化过程一方面只受其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分布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受益于这些国家的殖民政策:它们可以利用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投资于工农业,吸收过剩的劳动力,也可将过剩的居民移往殖民地或不发达国家,从而避免了人口大量流入大城市。因此,这些国家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协调的,农村剩余人口与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基本相适应。而拉美地区则不同,二次大战前,拉美就已被纳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许多国家成为工业国家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广阔市场,其经济向单一产品畸形发展。战后,在国内外资本主义生产分布规律的作用下,工业和农业、城乡经济不仅没有协调发展,而且使战前的不平衡状态进一步加剧。至于向国外移民,数量也很小。拉美(除加勒比国家外)从1950-1977年只向美国移民一百九十多万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32页。

^② 《农业经济译丛》,1980年第4期,第230页。

人^⑨。农村过剩人口主要流向城市。

拉美城市化的经济社会影响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过程中，人口城市化既是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分布规律，城市化发展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战后拉美的城市化也不例外。

加剧了地区经济不平衡

战后，拉美各国的工业化政策使人口、经济更加集中于大城市，城市化过程愈来愈趋于大都市化。1970年墨西哥城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4%，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9%，运输业产值占全国运输业产值的58.1%，服务业产值占全国服务业总产值的49%^⑩。七十年代，巴西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集中了全国工业就业劳动力的50%。在里约热内卢，商业和服务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占全国商业和服务业就业总数的11%以上^⑪。阿根廷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经济活动集中在首都及其周围的人口稠密地区，首都和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业生产占全国的三分之二，批发贸易的销售额占全国的70%。为了维持大都市化，政府每年需花费大量资金，如墨西哥政府将其财源的45%左右用于联邦区的建设，而从联邦区得到的税收只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9.52%^⑫。大都市享受并独占国家给予它的特权和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这使它同其他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据美洲开发银行1980年的资料，拉美的人均收入在过去二十年中提高了71%，但是，靠耕地为生的农民的收入只增加8%。农民的实际收入年平均增加不到0.5%，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占人口10%的富人手中。据拉美经委会统计，七十年代，10%的家庭获得总收入的44%，而40%的家庭只获得总收入的8%。拉美40%左右的人口由于购买力低下，实际被

排斥在市场之外。贫富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

扩大了产业后备军的队伍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⑬战后拉美城市化进程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以拉美十四国为例，1950年的失业率为3.4%，1970年上升至3.8%，1980年达到3.9%。城市的失业情况更为可观。据专家估计，拉美城市失业率通常在25-30%，甚至更高。1980年，拉美共有一千八百多万失业者，还有一千六百万半失业者。如此惊人的失业和就业不足，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弊病。

加深了对外资的依赖

美国学者阿瑟·刘易斯说：“十九世纪欧洲贷款国和富裕的借款国之间的差别，是由城市化速度不同决定的。城市人口每年增长速度低于3%的国家（法国1%、英国1.8%、德国2.5%）给别国贷款，城市人口每年增长超过3%的国家（澳大利亚3.5%、美国3.7%、加拿大3.9%、阿根廷5.3%）向别国借款。”^⑭他认为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高额费用决定的。因为城市建房所需的费用比农村多得多。城市必须提供医院、自来水、公共交通。农村居民修建住房、道路和水利灌溉等设施多自己动手，即使他们雇用建筑工人，所付的工资也较少。况且农村居民不雇用建筑师。

随着城市人口日益增加，基础设施规模

^⑨ 道格拉斯·波特沃斯等《拉丁美洲城市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⑩ 韦恩·科尼利厄斯等著：《拉美大都市：挑战与反应》1978年哲人出版社，第62页。

^{⑪⑫} 同⑩，第266页、第9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707页。

^⑭ 阿瑟·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页。

不断扩大,拉美各国大力吸引国内外私人投资,以满足城市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以墨西哥城为例,虽城市供水量不断增加,1960年每秒供水20.3立方米,1976年增加到42立方米,但人均供水量下降,同期从360立升降到335立升。为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和工厂未来的需要,兴建了从二百公里外的迪高路特拉和高巴拉斯河引水工程。在供电、煤气、交通等方面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新建一条排水系统需投资五十四亿比索,三条地铁线约需六十亿比索,环城公路二十四亿比索^⑤。此外,高等院校、中小学都要花费大量投资。因此,墨西哥城的财政需求日益增长。政府为维持该城的发展,除从国内其他地区筹资,进一步削弱落后地区的投资能力外,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近年来,墨西哥城的偿债额以年平均87%的比率迅速增长。拉美各国城市化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与墨西哥城类似的问题。拉美二十五个国家公共外债1960年只有七十二亿美元,到1982年就增加到二千零八十三亿美元。造成拉美外债激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和这些国家的过度城市化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农村向城市移民的 社会经济意义

尽管拉美城市化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端,但是无可否认,它在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中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的。

首先,战后拉美城市化满足了城市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众所周知,资本主义要获得迅速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资本和劳动力。战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分布规律的作用下,人力、物力、财力日趋城市化,城市产业获得飞速发展。从1950-1980年,主要集中在城市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特别快。如以1950年为100,则1980

年时,第二产业中的加工工业(采矿业、制造业、电、煤气、水)达699,建筑业为555,第三产业中的运输、通讯达603,商业为536,服务业为480。^⑥这些部门的生产增长幅度都在三倍以上。第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过剩人口,补充了城市就业队伍。1980年,拉美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经济活动人口的24%,在服务业就业的劳动力占经济活动人口的45%。

战后,拉美城市化过程,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过程。战后拉美城市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表现,造成劳动人民的贫困化是资本的属性决定的。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的进步、“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⑦。奴隶制是非常残忍的制度,但是恩格斯认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资本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肯定了它的历史进步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战后拉美城市化也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

关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进步社会、经济意义,列宁指出,迁移对改变人们的观念,提高知识水平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他说:“‘迁移’意味着造成居民的流动。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居民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居民的开化,而认为任何一所农村学校都能使人获得人们在独立认识南方和北方、农业和工业、首都和偏僻地方时所能获得的专门知识,那就太天真了。”^⑧列宁又说:“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

^⑤ 同^④,第64页。

^⑥ 陈沙:《世界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世界经济》1985年第4期,第7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24-125页。

^⑧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旋涡中。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⑩他联系俄国的情况，指出了农村向城市移民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居民离开农业，在俄国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这一点部分地被国内移民所掩盖了）以及城市近郊、工厂村镇与工商业村镇的发展上，并且也表现在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现象上。所有这些在改革后时代已经和正在向纵深和宽广两方面迅速发展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⑪城市生活确实能改变农民的旧观念，使他们产生现代的观念。据调查，在距墨西哥城二百三十里的一个村庄，1945-1974年有70%的村民移往城市。七十年代以来，移民回迁的数量增加。这些人带回了新的观念，对其他村民产生很大影响，加上电视机、收音机等媒介不断向村民传播城市文明信息，村民在观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人们普遍重视学校教育；妇女宁可购买而不再在家里做玉米饼，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零售或打散工，这证明“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已逐渐形成。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显示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而不害怕邻居的嫉妒，并且以获取物质财富向地位和特权挑战。村民们也不再聚在地方小圈子内互相争夺机会，他们认识到在国家和国际的大范围内亦可获得个人生意上的成功。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传统的做法正被抛弃，新的生活方式、价值和观念正在树立。

其次，人口城市化也具有巨大的社会革命意义。恩格斯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竞

争怎样以大规模经营方式挤掉了小农，把他们降到无产者的地位，然后把他们一批一批地赶到城市里面去。我们也看到，竞争怎样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于破产，把他们也变为无产阶级；竞争怎样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怎样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在现代工业中获得充分发展并能使自己的一切后果无限加深的竞争，就是通过这些途径和方法创造了无产阶级并扩大了它的队伍。”^⑫又说：“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⑬。战后，拉美城市工人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几年来，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民民主化进程中，城市工人阶级起了重要作用。1976年初，海地杜瓦利埃独裁政府的垮台，城市人民的斗争也起了关键作用。正如巴西圣保罗市市长马里奥·科瓦斯所说，一方面，都市化集中了拉美国家的许多问题和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城市也集聚了进行变革的巨大力量。城市可以促进每个国家的文化统一，同样也是开展解放斗争、民主化、争取平等和自主的政治舞台。

^⑩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0页。

^⑪ 同^⑩，第534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59页。

^⑬ 同^⑫第407-408页。